

经典

现代萨迦：希格丽德·温塞特的一生

□杨靖

萨迦(Saga)本意为口头讲述或吟唱,广为流传的中世纪北欧家族和英雄传说多以此为名,现代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也时常采用这一体裁,其中以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女作家希格丽德·温塞特(Sigríð Undset, 1882—1949)成就最为卓著。温塞特获奖作品《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又名《劳伦斯之女克里斯汀》, 1920—1922),三部曲包括《花冠》(Wreath)、《新娘》(The Wife)和《十字架》(The Cross),长达1400余页,属于“史诗级”巨著——评论家由此将其誉为“现代萨迦”。同时代俄国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1892—1941)对它更是推崇备至,宣称“与《克里斯汀的一生》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只是一个片段而已”。

温塞特出生于丹麦西兰岛的卡隆伯尔格小镇,她的父亲是著名考古学家,致力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居民史前生活的研究。她的母亲是移居丹麦的苏格兰名门后裔,学识广博。温塞特是家中长女,在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受聘于克里斯汀尼亚(今奥斯陆)大学附属的一家博物馆,举家搬迁至挪威。1888年起,她在奥斯陆的私人学校接受教育。1893年,父亲不幸早逝,温塞特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选择在一家工程公司担任秘书,以微薄的薪水供养母亲和两个妹妹,业余并坚持阅读与写作。

1907年,温塞特处女作《玛尔塔·欧利夫人》(Fru Marta Oulie)发表,由于书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探讨(小说开场白“我曾对我的丈夫不忠”)而引发轩然大波。两年后,她模仿冰岛英雄传奇体裁的小说《居纳尔的女儿》(Gunnar's Daughters, 1909)出版,获得评论界好评,并获得政府的津贴,开始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同年,温塞特在外国邂逅挪威的天才画家A. C. 斯瓦斯塔,3年后两人结为夫妇。

温塞特早期作品还包括名作《燕妮》(Jenny, 1911),作品所展示的人物心理刻画及叙事技巧进一步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之后问世的《春天》(Spring, 1914)、《镜中的影像》(Images in a Mirror, 1917)等小说,也广受赞誉。随后,温塞特转向中世纪历史题材。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连续推出两部顶尖水准的巨著《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和《艾于敦松》(Audunsson, 1925—1927),包括《奥拉夫·艾于敦松》(Olav Audunsson)和续集《艾于敦松与他的孩子们》(Olav Audunsson and His Children),后者在技巧和境界方面,显示出与前者同样的圆融与成熟。

1924年,温塞特与斯瓦斯塔离婚,并在同年改宗归化为罗马天主教徒,这在新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北欧国家引起轰动,甚至被视为一桩“丑闻”(温塞特被讥为“天主教夫人”)。此后她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创作《野兰花》(The Wild Orchid)及其续篇《燃烧的丛林》(The Burning Bush),以及《伊达·伊丽莎白》(Ida Elisabet)与《贞洁的妻

子》(The Faithful Wife)。在上述中后期作品中,除了关于当代女性困境的描画,也显示出她改宗后日渐浓厚的宗教情结。

1939年,温塞特的母亲与女儿相继去世,使她经受沉重打击。1940年,德国纳粹入侵挪威后,温塞特转道去往美国。她撰文抨击纳粹暴行,在美国及国际文坛赢得了巨大声誉。经历长达5年的流亡之后,温塞特于1945年重返故乡,并于1947年荣获挪威国王颁发的“奥拉夫大十字”奖章,成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平民女子。1949年6月10日,由于癫痫性中风发作,温塞特病逝于她的故乡利勒哈默尔。身后留下的作品卷帙繁浩,仅小说数量便达36部;另有戏剧、短篇故事及演讲论文集和传记等大量作品,其中以《男人、女人和位子》(Men, Women and Places, 1939)和《挪威的幸福时光》(Happy Times in Norway, 1947)影响最大。此外,她对乔叟、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和奥斯汀等英国作家颇有研究,她身后出版的《圣徒卡特琳传》(Catherine of Siena, 1951)也堪称传记文学的杰作。

希格丽德·温塞特的代表作品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13、14世纪为历史背景,反映当时贵族及平民生活的英雄传奇和家族萨迦;另一类则是反映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挪威社会生活的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受父亲熏陶,她自幼便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后来的作品中,更试图以传奇萨迦及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她在创作《克里斯汀的一生》三部曲之前,曾花数年时间亲赴当地查阅档案,收集文物资料,并多次就有关细节向历史学家求教。可以说,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如评论家所言,是“天才的叙事技巧”与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的结合;而另一方面更是作家长期勤勉不懈、孜孜以求的结果。

在这部被誉为13世纪北欧“家庭史诗”的巨著中,温塞特以雄厚悲壮的笔力和精细入微的刻画,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女主人公克里斯汀一生的行踪遭遇为线索,温塞特对中世纪挪威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宗教思想、文化艺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描写。与此同时,作为“历史记录者”,温塞特也描写了中世纪的传说与仪式,包括以血祭求得魔鬼救赎、森林妖精法术、以及女巫催情/孕药等等,尽管并未浓墨重彩加以刻画,却展示出史诗的磅礴气势和厚重感。她的诺贝尔授奖辞“主要是由于她对中世纪北国生活之有力描绘”中的“有力”二字,最能体现这种风格与气度。评论家一致认为,“《克里斯汀的一生》充满诗意和人的真实,现代文学只有极少数的几部作品能够与之媲美。它已成为挪威文学中纪念碑式的作品”——堪称公允之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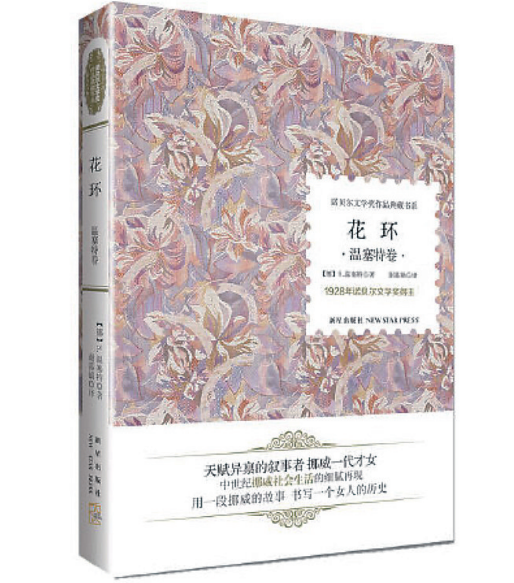
小说人物克里斯汀一生遭遇坎坷,历经磨难,

但正如温塞特本人自言,这都是她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困难面前,她没有选择退让,也从不轻言放弃,而是以极大的热忱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逆境中恪守操守并顽强搏斗,这也体现出温塞特一贯之的道德理想:即身为女性,无论处在什么年代,都必须尽到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最高职责——在成就他人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温塞特满怀同情,在克里斯汀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生活主张和宗教伦理思想,也正是这部作品能够打动人心、感人至深的主要原因。

在艺术手法方面,小说所采用的历史事实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也颇引人注目。温塞特对于小说中故事场景的刻画几乎完全再现了当年的历史面貌,甚至人物的服饰、器具与语言也无不与历史相符,说明她在这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情。与纯粹“意识流”的心理分析不同,温塞特在小说中往往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特定的场景和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来自于现实生活具体事件的感悟,虽然不似“意识流”那般开合自如,使人浮想联翩,但笔墨更为集中,激发的感情也更为强烈。

温塞特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她对重大历史题材的驾驭。由于自幼浸淫在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之中,同时也由于作家本人沉静的天性和严谨的态度,经过她的描摹勾勒,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仿佛一下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鲜活”起来。作家不仅复制出中古时代挪威王宫节日、宗教仪式、政治阴谋等场景,也再现了当时的自然风貌、历史事件和风俗文化传统。这一“复制”的成功,除了广博的学识和悲悯的情怀,更体现出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语言天赋。事实上,正是上述因素的合力,才使得这部历史巨著呈现出深广雄浑的厚度——“有时,读者甚至可以在这片浩瀚而平静的水面上窥见无边无际的倒影,从而体悟到人类的伟大。最后,女主角克里斯汀为她的生命奋斗到底,河流也就汇入了大海。”

温塞特文学创作最初受北欧传奇和中世纪民谣影响,后来又受到同时代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和切斯特顿的启发。19世纪中后期,北欧由封建小农经济迈向资本主义,文学艺术也随之开始寻求突破。1871年,勃兰克斯发表“19世纪文学主流”演讲,抨击神学对斯堪的纳维亚艺术的束缚,呼吁作家干预生活,研究者而非神。他认为宗教强加的社会道德和两性观念禁锢了人的情感,而他则提倡一种从现实出发对人的生物学理解——两性关系的禁忌被打破,北欧“文艺复兴”序幕也由此揭开。温塞特中期以后作品多以探讨妇女地位为主题,正是响应了勃兰克斯的倡导。从长篇小说《燕妮》开始,温塞特着力描写当代年轻妇女的现实生活:她们或为追求爱情不惜牺牲前途;或因一时失足而堕入风尘。总之,为了幸福,她们



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作为新一代觉醒的女性,她们既反抗传统,也不愿从现行社会制度中寻求庇护。因为在她们眼中,二者同样是负担和枷锁。温塞特念兹在兹的是怎样为她们(以及她本人)创建一种新生活。

1912年旅居英国期间,温塞特有机会结识伍尔夫、劳伦斯等文坛名家,对天主教作家切斯特顿(1874—1936)尤为倾心。切斯特顿在《英国简史》中对古今女性的命运抱有同情态度,主张理解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这一思想对温塞特“两性和谐”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众所周知,温塞特并非女权主义者,更没有像女权主义者那样将男性视为头号敌人:她主张女性通过反思自我及部分改变性格特征来获得解放,换言之,即“两性和谐”的生活在于互相尊重各自性别的差异(否则女性难免陷入自卑,男性则会背负无限重压)。作为历史学家的切斯特顿对中世纪的研究令温塞特深受启发。他认为“黑暗的”中世纪并非暗无天日,而是连接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一座闪亮之桥。他坚信无知和野蛮并非源自信仰,而是源于偏见,并进而质疑科学的“万能”——培根被誉为“启蒙”和“理性”的圣人,在这位科学家看来,似乎人生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实验加以解决。因此,从中世纪历史中人们应该学会尊重多样性,来克服当下自大而狭隘的文化观。温塞特晚年花费数年撰写14世纪圣徒卡特琳传记,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科学/理性至上”论的强力反驳。

1970年代西方文化批评派对温塞特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文化批评派赞同温塞特女性独立的价值观念以及蔑视传统性道德的激进立场。比如她在作品中极力淡化贞操观念,宣扬“背德之爱”,并公然宣称“只要出自自愿,我如何利用自己身



希格丽德·温塞特

体,与他人无关”。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叛逆者的形象(《玛尔塔·欧利夫人》英文副标题为“一部背叛的小说”),因为“循规蹈矩的女性很难垂名青史”。另一方面,文化批评派又反对她关于两性和谐的调和折中论,讥讽这一论调是“男性保护神的福音书”,甚至指斥其为“反女权主义者”(温塞特有子女三人,也成为她的一大“罪状”)。以《玛尔塔·欧利夫人》为例,故事讲述一名职业女性(画家)遇人不淑,结果生下残疾儿,最终绝望自杀。女权主义者憎恨这部小说,认为其中的“思想既反动又危险”。与之相反,小说《春》中的女性遭遇婚姻危机后却选择了原谅,最终回归家庭并安享幸福——这一主题显然背离了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旨。其他如小说《燕妮》宣扬再聪明、再坚强的女性也可能误入歧途(并最终通过最软弱的男性获得拯救);小说《西蒙森》揭示婚恋过程中女性较易受到伤害:“爱摧毁女人,而不是男人”,并将“大多数婚姻失败”归咎于男女两性“过度渴望了解对方”。总体而言,温塞特主张女性从家务中解放,从而争取更多劳动权益和政治权益,而不是一味“憎恨男人”。相反,只有承认两性差异客观存在,并通过爱与责任相互包容、相互弥补,才能实现真正的两性融合,而这恰恰是人性之真谛。在温塞特看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统统不管用,因为它们都抹煞了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麦著名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1885—1962)宣称《克里斯汀的一生》“犹如持续恶劣天气下完成的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温塞特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黑暗,更描绘了光明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温塞特不但是文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她在荣获诺贝尔奖之时,便宣布将奖金半数捐出,用于设立残疾儿童基金。1940年,为支持芬兰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她又将奖金另外一半悉数捐出。1930—1940年代,她担任挪威笔会主席,为宣传推广北欧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女性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海伦·阿尔弗雷德曾说:“我希望每一位16岁少女都拥有一册《克里斯汀的一生》。她会发现一个新世界”——因为从中可以读到现代萨迦,读到温塞特传奇的一生。

立陶宛新生代诗选《我行走在你身体的荒漠》:

一种可贵的对照

□赵俊

在大部分情况下,出版社会选择经典作家与诗人的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安全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书系最近推出的《立陶宛新生代诗选》显然还称不上一本经典作品,它大概率不会成为“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可是,这样的读本却在当下显得难能可贵。就是,公认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已经出版书,而且已经有众多的译本,出版社只要挑选出好的译本,它所需要承担的风险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但发现经典却是一个出版社所更需要承担的文学生任。

在大多数的国人眼里,立陶宛不过是个蕞尔小国,就算精通地理学的人也未必报得出它的首都。当然,在文学的世界,国土面积的多寡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可是,就算在东欧的文学版图里,立陶宛也没有自己鲜明的存在。这在蓝色东欧丛书的目录里也可见一斑,这是目前为止该丛书惟一出版的立陶宛书籍。

立陶宛,作为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对于我们而言是神秘的。对于我这样一个青年诗人,阅读这本书却是大有裨益的。从入选的诗人来看,他们大都和我年纪相仿。他们之中,无论是最年轻的阿纳斯·艾利索斯卡斯(生于1970年)到最年轻的拉姆尼·布伦扎伊提(生于1988年),基本上在生活的时代经验上,都能和我发生某种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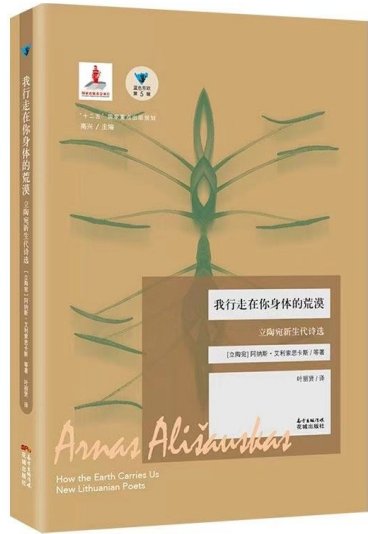
在英译本前言中,编者瑞玛斯·乌兹吉瑞思说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苏联随后的解体引出了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文学问题——新获自由的文学界,文学读者的人数减少了。根据学者加布瑞尔·盖利乌斯的说法,苏联时代一本小说的平均印刷量是24000册,而到20世纪90年代,下降到大约1500到2000册。诗歌在占领时期备受看重,部分原因是它能以“伊索式”语言表达民族主义情感和向往,甚至表达批评意见。但现在这个读者的数量也减少了。

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是普遍存在的。蓝色东欧丛书策划、《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跟我讲过一个事例:东欧某国的作协在剧变之后已成为纯粹的民间组织,由于没有经费来源,他们将大部分的房租租给了赌场,租金用于维持日常开支。给文学松绑之后,“保姆式”的作协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难题。

在中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在我国迅速兴起,文学杂志销量锐减、写诗的人大多放弃了诗歌改去经商,剩下的不少“60后”诗人还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好……对于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而言,其实早已过了诗歌的黄金期,诗人身份的附加值已被无限降低——在我所处的城市深圳,很多青年诗人白天干着白领的工作,晚上在默默写诗,可是,他们大多都在同事和家人面前隐藏起自己的诗人身份。

本雅明说:“达达主义者很少重视其艺术作品在商业上的实用性,而更多地推崇其艺术品作为景观对象的无用之用。”随着时代的推进,不论是立陶宛还是中国,虽然造成“无用性”的原因可能略有不同,但对于两国的青年诗人而言,却在越来越接近达达主义者推崇的这种“无用之用”。因为关注度的下降,可能诗人们更能接近本心。

《我行走在你身体的荒漠》开篇第一首《土豆雕成的立陶宛》,名字很诗意,他的乡村经验从一颗土豆开始,但它的着眼点落到祖国、信仰之上,“只要你能从刚刚起飞的飞机上看到自身/你就会看到一个黑轮廓,接着连影子也消失”。这暗喻着他们国土面积的小——“只要一飞飞机一起飞,就能飞出立陶宛‘黑轮廓’的边境线。关于信仰的问题,诗人在最后得出结论:“我知道:在立陶宛,苍鹭仍被偷偷地献祭”,这和开端的一句有着呼应“白鹤满身是血地飞回来,但仍是可喜的景象”。在这里,苍鹭和白鹤



都是殉道士,“土豆雕成的立陶宛”这个隐喻,也许就是指信仰和现实在这个国度的冲突。

是的,祖国是如此狭小,所以立陶宛的青年诗人有向全世界诗歌学习的勇气,我不知道俳句在立陶宛的诗歌体系里会被翻译成什么模样,但他们确实已经有了这样可贵的尝试。俳句一直在西方受到重视,不少诗人都有过俳句创作的经验。立陶宛的青年诗人也有这样的尝试。比如瓦利乌卡斯就创作了好多的俳句。“最后一样/将我们分隔的东西/是衣服”,也许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也许讲的是一次彻骨的分手。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曾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这样写道:“对他(彼特拉克)来说,‘现代人’仍然是中世纪的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他们知道未来将恢复‘纯净的光辉’。彼特拉克自己尽管有着相互矛盾的忠诚,却仍然因对未来的信念而奋发。这使他不曾变成古代人辉煌成就的一个被动崇拜者。相反,他对古代的崇拜是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远不只是尚古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忧伤带着那种“纯净的光辉”,在立陶宛的某座屋子里用暖炉烘烤的忧伤,“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如果从王国维的理论来分析,两人的俳句都是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近日,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了瑞典作家拉斯·古斯塔夫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养蜂人之死》。古斯塔夫松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曾荣获托马斯·曼奖、古根海姆奖、瑞典贝尔曼奖等多项重量级文学奖。身为歌德奖章得主,古斯塔夫松在北欧文坛享有崇高声誉;在瑞典,他与特朗斯特罗姆齐名,两人被尊称为“一双瑰宝”。

身兼诗人、作家、学者三重身份,古斯塔夫松著作颇丰,他的诗集《诗选》被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专著《西方正典》中列入经典之列,他的小说也充盈着来自诗人的独特灵性和智慧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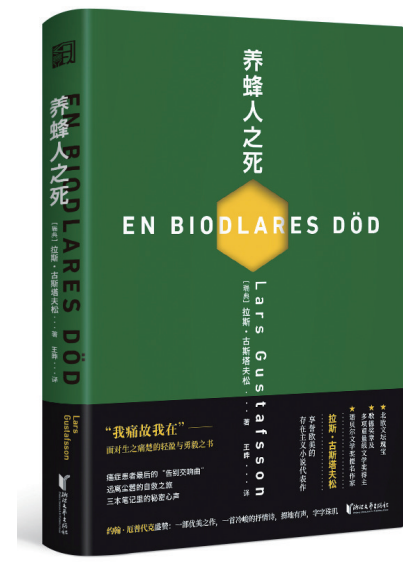
作为风靡欧美的存在主义小说代表作,《养蜂人之死》在法国《理想藏书》中位列“北欧文学”好书第三名,并曾被译为15种语言,受到万千读者的喜爱。美国当代文学大师约翰·厄普代克盛赞本书为“一部优美之作,一首冷峻的抒情诗,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更有美国学者认为本书是古斯塔夫松“最优秀的作品”。出版43年后,这部著作的中文版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在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中,古斯塔夫松以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着特殊境况下微妙的体验,探究着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养蜂人之死》的故事源于“疼痛”,并深耕“疼痛”这一主题。小说序章引出三本内藏玄机的笔记本,笔记本的主人——一位饱受病痛折磨的养蜂人维斯汀,正是小说的主人公。早春时节,从小学教师转行而来的养蜂人维斯汀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时日无多。焦躁的他面对医院寄来的诊断书,没有撕开信封,而是将之扔进了壁炉。他没有前去医院寻找渺茫的希望,反而走入乡间,独自开始“自救之旅”。这段隐居生活中,疼痛始终与他相伴,也令他的感觉越发敏锐。他开始回忆过往,想起自己儿时目睹的惊人画面,家族里古怪有趣的长辈,自己恋情的细节……

维斯汀遗留的笔记构成了《养蜂人之死》的故事正篇。笔记本中,各式各样的信息杂糅交错,勾勒出主人公与病痛纠缠期间的内心世界。日常的所见所感,记忆中蒙上虚幻色彩的细节,对婚姻、社会和现实生活真谛的哲思……记述中不乏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打趣,时而情绪迸发,时而平静忧郁。富于感情的笔记间夹杂着文摘、病程记录、开支记录、蜂箱备忘录等资料,折射出养蜂人内心之外的生活面貌。翻阅这些笔记,我们仿佛跟随维斯汀的脚步经历了一场疼痛之旅,体味了病程中颠簸起伏的心绪。

病痛之下,轻盈与勇毅的自救之旅

□易尚奇



古斯塔夫松坦言:“这是一部有关痛苦的书,它描绘了由疼痛统治的、通往终点的旅程——疼痛之下,别无其他。”在容不得停歇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似乎总与痛苦同行——因疾病或亚健康而饱受身体之“痛”,因压抑和孤独而备受心灵之“痛”。我们总被安慰“你一定可以战胜疼痛”,被教育“痛苦也是良药”,但事实有时与希望相悖。养蜂人维斯汀对“痛”的反应与许许多多的“我们”别无二致:面对横亘在前、越发浓重的噩运,忍不住想要逃避;对于不时滋扰的疼痛感,难以遏制地发出抱怨声。没有故作坚强的话语,维斯汀坦陈自己的不满意、不甘心,忠于自我感受的他不是某种“铁血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真诚的人。

生之江路将尽,维斯汀让自己的感官沉入生活细节,更将自己的思维放飞至现实之上的广袤之境,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充实。“那些没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强大。”透过笔记中的文摘片段,我们仿佛能看见维斯汀不屈服的眼神。这个本真的人仿佛在说,我痛故我在。

中文版《养蜂人之死》由瑞典作协会员、翻译家王晔直接由瑞典语原著译出。王晔于2016年荣获瑞典学院翻译奖,她的译作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高度赞赏,均是反复推敲后的心血之作。她与古斯塔夫松及其亲友深度交流,坦言“古斯塔夫松探索近距离的真实生活,被看作一位启蒙者、符号解释者、百科全书家以及有远见的人”,而《养蜂人之死》正“实践了古斯塔夫松的小说观”。